中美贸易的走向



□ 王东京

两个月前访美，当时美国大选正在胶着状态，西方媒体对特朗普与希拉里谁会当上总统众说纷纭，多数人说是希拉里，也有不少人说是特朗普。现在大选揭晓，特朗普成为新届美国总统。尘埃落定，结果学界又开始关注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走向。

隔行如隔山。我研究的是经济，对中美政治、军事、外交等皆没有发言权，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是中美经济，而且重点只讨论特朗普掌权后中美贸易可能出现的变数。看到网上消息，特朗普入住白宫第一天就放言叫停TPP。海外舆论称此举是特朗普送给中国的一个大礼。是不是大礼不好说，至少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

前些天，乔治城大学德吉奥亚校长一行造访中央党校，双方很自然谈到了中美贸易。美方专家提醒说，中方应关注近期特朗普内阁组建的动向。内阁成员对华贸易的倾向当然重要，但我认为关键还是美国国内各大利益集团间的博弈。美国是个实行投票政治的国家，利益决定投票，不管谁出来主理对华贸易，都不可能无视他们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

说一件有趣的事。上次访美期间曾与德吉奥亚先生共进早餐，席间他告诉我美国大选可能胜出的是希拉里。德吉奥亚是校长，他的看法无疑有广泛的代表性，值得信。可该校丹尼斯·奎因教授在为我们作题为“国际贸易对美国经济影响”讲座时却很肯定地讲，赢得本次大选的是特朗普，并预测特朗普的得票率将达51.62%。他借助经济模型作分析，头头是道，似乎也无可置疑。

今天看，还是奎因教授技高一筹，大选结果应验了他的推测。不过尽管他推测的结果对，但我却认为他的推理有疑点。也许读者会问，既然结果对推理怎会错？当然可能错。比如我推测天津会下雨，如果天津真下雨我的结果就算对了。可这结果是怎样推理出来的呢？原来，是北京在下雨，而依据以往经验，北京下雨天津通常也下雨。请问，你觉得我这推理可靠么？

我说奎因教授的推理有疑点，主要是我不同意他对美国经济结构的分析。我曾当面向他提出过质疑，可惜那天到了我们约定访问布鲁金斯学会的时间，未能深入研讨。这里先让我将奎因的观点作扼要介绍，然后再说我对他的质疑。

奎因教授说，根据他对大选投票的观察，美国从中国进口量较大的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选民更容易接受特朗普。他用计量模型算出，与布什当年的支持率相比，一个地区从中国的进口量（2000年—2014年）每提升1%，特朗普的支持率会增加2%以上。他举证说：威斯康星州齐佩瓦族县，从中国进口上升了2.4%，特朗普的支持率则上升了8.7%；密歇根州布兰奇县，从中国进口上涨了3%，而特朗普的支持率则上涨了13.3%。

何以出现此现象？奎因的解释是，特朗普主张贸易保护，而限制进口可增加国内就业。对限制进口为何能增加美国的就业，奎因指出了两点理由：一是近三十年美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制造业日益萎缩，服务业快速发展；二是由于制造业产品可出口（tradable）而服务业产品通常不出口，这样出口少、进口多就挤压了国内企业。若限制进口，在保护国内企业的同时也就增加了就业。

对奎因教授的分析，我有三点质疑：

首先，奎因说美国从中国进口量大的地区，特朗普的支持率也高，统计检验是强相关。我相信他讲的是事实，但这事实却不能证明两者有因果关系。懂数学的读者知道，用任何两个同向变量作回归分析，相关系数都很高，但相关系数高并不代表它们之间就有内在关联。如树长小孩也长，但树长并不是小孩长的原因。

其次，奎因说美国制造业萎缩和服务业比重增加减少了美国的就业，理由是制造业产品可出口而服务业产品通常不出口。此理由也似是而非。我的观点，一个产品是否可出口不能孤立地看，要从整个产业链来考量。比如某纺纱厂的纱锭没直接出口而是卖给了国内某纺织厂，若该纺织厂的布匹出口了，纺纱厂的纱锭其实也就出口了。服务业产品也一样。理发师的服务虽不能直接出口，可他为软件工程师理发，如果软件工程师将软件卖到国外，理发师的服务不也出口了么？

再次，奎因认为限制进口可保护美国制造业，增加就业。对此我也不苟同。我坚信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分工理论不会过时，美国制造业萎缩而服务业增长快，这只能说明美国服务业的投资收益率高于制造业收益率，服务业是美国的优势所在。资本本性是逐利，若服务业收益率更高，就算政府限制进口，美国投资者也未必投资制造业。前几年奥巴马就宣称美国要回归制造业，可制造业至今萎靡不振已足以证明这一点。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演进有其自身规律，并不能由某个总统所左右。由此看，未来中美贸易走向也不取决于特朗普。即便特朗普限制进口，美国的经济结构也不会逆转。美国处在国际分工的高端，贸易自由对它们有利，何况限制进口会引发贸易战，美国不可能长期限制进口。

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应对。特朗普一方面叫停TPP，同时又多次宣称中国是“货币操纵国”。以前美国抱怨中国操纵货币，是说人民币未按美国的预期升值。而今天人民币有贬值压力，中国抛外汇资产防止人民币贬值怎也遭到指责？特朗普到底要说什么恐怕连他本人也不清楚。我们关键是要守住两点：一是守住汇率以减少贸易摩擦；二是扩大出口并积极进口，守住贸易平衡。

世界经济

专家视点

新冷战还是冷和平

□ 刘建飞

近来，随着北约与俄罗斯都强化在东欧的军事部署，“新冷战”又成媒体上很抢眼的词汇，有人称北约或美国与俄罗斯又走向冷战。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若认真辨析，“道理”便大打折扣。

在国际关系学中，“冷战”一词是专指当年的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尖锐对抗而又未直接进行战争的状态。冷战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尖锐对抗的两个超级大国没有直接交手，尽管其中一方同另一方的“代理人”打过仗。比如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期间，虽然苏联支持越南，但是苏美两家未直接交手；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美国也是支持阿富汗反苏力量，并未直接参战。冷战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同时对抗，即双方总体关系是对抗的，虽然在某些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具体事务中有合作，比如美苏在限制核武器及导弹系统问题上就签署了许多协定，在中东阿以冲突上也有合作。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不仅经济上互相封锁，各搞一个经济合作体系，苏联阵营有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美国阵营有马歇尔计划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而且还在军事上结成互相对峙的军事同盟，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华约），两大军事同盟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乃至核军备竞赛。特别是在政治上，双方在意识形态上互相攻击、抹黑，势不两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心目中，意识形态对抗是冷战的核心内容。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宣言”发表标志着冷战的开始，该宣言主要内容就是讲美国要带领资本主义世界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世界的进攻。而作为西方国家军事同盟的北约直到1949年才建立。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拆除后，美国便宣告冷战结束了，因为苏联不再与西方为敌了，尽管此时苏联仍然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所以，冷战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政治阵营的对抗，军事、经济、文化对抗居从属地位。认识冷战，还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同盟体系。冷战是相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两次世界大战而言的，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两个国家集团对抗，区别只是冷战对抗双方一直保持“冷静”，对出现的局部冲突进行“冷处理”，尽量避免走向“热战”。当然，两大集团都有核心国家，从一定意义上说，冷战就是美苏两国的对抗，不过，美苏两家国的实力相当接近，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对整个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形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从上述冷战的特征来看，目前无论是美俄之间的对抗还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都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冷战。美俄之间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俄罗斯并不是同美国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也没有足以抗衡北约的军事同盟；双方之间谈不上有军备竞赛。可以说，人们只不过是借用“冷战”这个词来形容双方关系的状况而已。实际上，早在2007年，普京就用“新冷战”来指责北约在一些东欧国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在冷战刚刚结束时，邓小平也用“冷战”一词来批评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他在柏林墙被拆除两周后对外宾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他对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两种潜流表示担忧。然而，27年过去了，这种潜流并未成为主流。中美虽然有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军事安全上的竞争，但是这种对立和竞争并不是双边关系的主流，远未超越两国在经济、安全、全球治理等层面的合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发展、人权等问题上有矛盾，但是多层面的合作却不断深化。双方都愿意在联合国大家庭内共处，共同维护并改革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近年来，二十国集团又成为两类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

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下美俄关系用“冷和平”来表达更为贴切。两个国家并未全面对抗，只是个别领域关系趋冷，而且这种“冷”也并非不可逆转。这种状态与真正意义上的冷战还相差甚远，但又不同于“热和平”下的国家间关系，所以是“冷和平”。当然，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俄关系的变化因素也增加了。

中国外交战略的“势”与“实”

中国的外交战略一定要坚持和发扬优良传统，着眼根本，立足长远，防止出现重实利、轻大势的战略错误，对外积极实施以经济合作为主导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内加快推进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在对外传播中增强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和平稳定的战略机遇期。

□ 范文仲

中国的文化中，常有取实与取势之争，而取势多优于取实。取势优于取实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明晰的最终目标，二是要对眼前利益与长远得失有清醒的分析。

当前中国周边战略格局

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大幅增长，但周边外交环境日趋严峻，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试图遏制减缓中国的发展进程或在国际舞台中孤立中国。在冷战思维的推动下，西方部分反华势力希望在中国的海洋周边建立一道封锁线。

在东海方向，由于钓鱼岛之争，中日关系一波三折。2012年1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国防授权法修正案。明确写到将钓鱼岛作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2015年7月，安倍政权炒作钓鱼岛争端，渲染“中国威胁论”，煽动日本众议院强行通过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自卫队行动自由。根据新安保法，即使日本没有受到武力攻击，也可以对他国行使武力。继去年日本海上自卫队阅兵之际驻日美军航母“偶然路过”之后，今年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其位于东京近郊的驻屯地举行了颇具规模的检阅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运输机，前来进行了“祝贺”飞行表演。同时，中韩关系出现波折，美国借机推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重启美日韩联合军演，美日韩同盟得以加强。

南海方向，南沙岛礁之争使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的关系正面临严峻考验。2013年1月，在美国的公开支持下，菲律宾违背自己在双边和多边协定中做出的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南海争议的承诺，向某法庭单方面提起针对中国的强制仲裁程序。美国积极向菲律宾提供军费和装备援助，同时通过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定》实现重返菲律宾军事基地的目标。与此同时，美一方面支持越南在西沙问题上挑起新的争端，另一方面实现解除对越南的非杀伤性武器的禁售。对美而言，煽动激化东海和南海岛礁主权之争符合美国的外交利益，也有利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南海周边地区的推进。

要科学地确定当前的外交战略，必须对中国的长期发展目标和外部主要矛盾有清醒的认识，全面分析眼前的利益得失和长远的国运消长。毋庸置疑，中国的长期发展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中国的发展趋势来看，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期和平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创造这样的战略机遇期。

实现这个战略机遇期最大的风险在于可能存在的中美冲突，中国全球战略最主要的矛盾大多集中于中美关系。当前，美国对华封锁的第一岛链正在成型，在周边政治外交领域形成了对我不利的局面。实际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争端，最终都体现为中美两个大国的战略博弈。如果中国能实现自己的长期发展目标，在经济、军事实力上最终取得飞跃，周边的外交领海争端才能更为顺利、彻底地解决。西方反华势力正是看到了中国发展对其影响力的威胁，竭力挑起争端，希望打乱中国的发展进程。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必须冷静地分清矛盾的主次，把握好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方法。

中国外交战略必须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

我们的外交战略必须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弃小实，取大势”，尽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家，争取发展的时间，不断积蓄力量，努力实现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比的决定性转变。

首先，中国对外应积极推行以经济合作为主导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尽可能广泛的经济同盟瓦解美主导的亚太政治同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实行国共合作，从而结成了包括一切抗日力量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当前，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应尽量突出经济合作的主调，避免激化领土领海争端的言论。化解周边国家对我发展的忧虑，培养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氛围。南海方向要借菲律宾政党轮替、新任总统杜特尔特“脱美自立”的时机，大力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投资平台，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淡化南海争端的影响。东海方向要进一步巩固和韩国的经贸关系，减少萨德危机的溢出效应，呼应日本内部的和平力量，防范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弹，同时继续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设立，削弱美日韩的战略同盟。在全球的外交战略上，应该确立“稳住美国，争取欧洲，经营周边”的基本原则。

其次，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才是外交战略的最终保证。在倡导和平外交战略的同时，中国对内要加快推进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利用好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经济领域，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在军事领域，应大力提升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水平，打造具有全球快速投射能力的智能型海军和陆战力量，有效应对突发的军事冲突和危机；加快发展能和美对抗的空间指挥信息系统，在空间战和信息战中不落下风；发展研制自主有效的反导系统，遏制美国的核威胁和周边地区潜在的核冲突。中国只有提高了经济和军事实力，才能为解决周边外交问题创造良好的条件。

要成为世界秩序、世界和平的坚定捍卫者，除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还必须有先进的制度文化优势，占据全球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道德高地。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以三权分立、全民直选、政党轮替为旗帜推行其所谓“民主自由”的人权观和价值观，实行“和平演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造成很大冲击。其实，世界上的政治体制千差万别，只有能实现国家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体制才是最优的体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只有适应、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才是好的政治制度。对所有政党而言，不要看其竞选的口号如何动人，而要看其领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能力。过去30年，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同期西方经济社会进步的幅度改善很小，国内多次爆发危机。事实证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独特发展模式更具有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有领导力的政党。在制定外交战略中，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自信。在对外传播中应注重宣传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分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开放先试点再推开等治国理政的经验。要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知道，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不是推销自己的政治体制，也不干涉别国的内政，而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和平共享发展经验，共同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在对外传播领域，有些事多做多说，有些事只做不说。多宣传经济成就，少宣传军事进展，力争以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讨论代替政治体制、领土之争，在意识形态、传统文化领域重新占据道德高地，尽快提升中国全球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总之，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的外交战略一定要坚持和发扬优良传统，着眼根本，立足长远，防止出现重实利、轻大势的战略错误，对外积极实施以经济合作为主导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内加快推进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在制定外交战略中增强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和平稳定的战略机遇期。

战略视角